

人的发展·和谐社会与国民幸福指数*

杨作书, 杨雪松

(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的重要体现;明确指出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走出若干理论认识误区;着重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是全面衡量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指标;初步探索“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

[关键词]人的发展;和谐社会;理论误区;国民幸福指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1-027-04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核心价值目标的重要体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的追求,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现了同人类所有进步思想特别是近代以来进步思想的共性继承,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目标的根本区别。它包含人类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对共同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人类所有进步的伦理价值,体现了对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真正追求,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趋势之中。它同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和传统相区别,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的能力、素质、独特个性、社会关系诸方面自由而充分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所追求终极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应当追求的重要目标,是革命导师在社会发展方面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劳动者“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将有充分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娱乐和休息”;“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①恩格斯曾科学地预言,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②马克思、恩格斯都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他们说:“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他们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表述,都是指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模式。列宁也强调:社会主义生产中,“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④“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充分保证社会全体福利和自由全面发展。”^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论述和预见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胡锦涛同志提出:“今天,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⑥这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现阶段中国的现实目标和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里推进伟大事业的重大理论创新。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新条件、新问题,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要求,对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新的探索,是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发展,怎样发展这样一个永恒主题的创造性回答。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走出若干理论认识误区

既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是,在实践中,有许多理论认识困扰着和谐社会的建设。

* [收稿日期]2006-09-12

[作者简介]杨作书(1942-),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杨雪松(1970-),重庆市第六十六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以传统 GDP 作为经济发展的标志困扰和谐社会建设

这是因为:第一,GDP 增长不等于社会福利的同步增加。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在人类经济活动量增加的同时,人们寻求的只能是他们真实福利的增长。而福利的增长至少有以下前提:降低不安全感,使每个人及家庭能够在经济活动中受到法律保护,且得以应付失业、老、病、意外事故等;社会向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保证个人及家庭的最低收入水平等等。这些先决条件的保障,既不能简单从 GDP 增长中反映,也不能说 GDP 的增长便能自动提供的。这说明社会福利的发展不一定与 GDP 增长同步。第二,GDP 的增长不等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公平。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判断经济和社会形势不能仅看表面繁荣,不能仅看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看结构的变化和协调。这个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我们现在也在关注结构问题,但兴奋点过多地集中在“加快国企改革”、“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提升市场化程度”等等问题上,至于关系广大民众基本利益的就业、教育、医疗、分配、生态等结构变化是否失衡就有些麻木了,没有对社会公共产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予以足够重视,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一些地方政府将 GDP 当作唯一的追求目标,从而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增长的代价和增长的公平。第三,人均 GDP 有可能模糊人们对财富差异的认识。当前我国 GDP 的增速以及财富的增速的确居世界前列。但是,这个增速仅仅表明“钱”越来越多,而并不等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随着 GDP 的较快增长,物质和货币财富当然在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面对悄然增长的城市和农村贫困群体以及快速攀升的基尼系数,我们的 GDP 能够反映出来吗?不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指数,恐怕不能算是一个好的测量指标。第四,GDP 不能反映社会成本。追求 GDP 增长,是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为代价换来的,即 GDP 增长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维持。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来,我国 GDP 增长了 10 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 40 多倍。2002 年,我国煤炭用量达 15.7 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32%,但创造的 GDP 还不到世界总产值的 4%。第五,GDP 作为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水分,如在一些农村,将稻草、人畜粪便等都折成收入计入 GDP,在城市,保姆、家教、私人房屋出租、私人装修,以及一些咨询、中介、广告机构等收入,绝大多数没有计入国民收入中,这就是说,GDP 存在有漏报的。在我国城市建设拉动的 GDP 增长中还有许多是拆、挖、填出来的。

其次,单纯以追求收入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困扰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不是物、不是钱、不是见物不见人,而是人本身,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人的发展的内部结构看,收入增长,导致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当然是人发展一个重要侧面,经济自由与经济收入有一致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收入就是经济自由的重要前提,从贫穷到富裕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经济收入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只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既不能构成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全部必要条件,更不构成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配合,收入

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可能反过来成为不幸福不发展的起点。因为金钱、物质财富,可以使人生活上富裕起来,也可以使人更堕落;可以使人更快乐,也可以使人更痛苦。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人生不是一个文明健康的人生。奢侈浪费、为富不仁也不是一个文明健康的人生。因钱而疏离、因利而反目也不是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所以,人的发展与人的收入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完全成正比例的关系。由此,需要我们深刻认识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除开人的物质生活层面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中与其他人相处中的地位、作用、人格被尊重的程度,享受民主自由的程度、与其他人之间的和谐程度,诚信奉献的社会责任,这可以用社会权利和义务来概括。精神层面的发展是指人的内心世界的真善美的境界,是否有远大理想的志向、坚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奋斗的毅力,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可以用人格素质来概括。

人的自身发展从内部结构看,是物质发展、社会发展与精神发展的内在统一。这就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上,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建设,再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四位一体建设。就人的发展的外部结构看,人的发展也是人自身发展与自然生态发展的统一,人的自身发展不是以破坏自然导致生态的恶化为前提,而是保护自然导致生态的美化为前提,这就要求实行绿色 GDP 指标,人越发展,就越尊重自然,关爱自然,人的发展体现为与自然发展相一致。

最后,市场化改革目标,有失社会公平,困扰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首先是利益和谐。因此,人民的利益应当是我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是革人民的命,这是我们改革“攻关”的一个底线。目前,我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涉及到我国改革的道路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的道路。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就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的道路,让市场经济的原则渗透和支配全部的社会生活,而成为市场社会,这样,权贵集团和强势集团成了市场化主体,市场中通行的是权力的规则,巧取豪夺成为市场中普通的牟利手段。这些年来一些领域改革的受阻和失败,如医疗改革和教育产业化改革以及农村中征地、城市中拆迁、官煤勾结造成的矿难、农民工领工资的困境、开发区建设中的官商勾结和国企改革与改制中出现的利益纠纷等,都与“泛市场化”的理念有着直接关系。现在,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共识,似乎为了建设一个好的体制,牺牲公平是一种必要代价。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和谐的对立面是失衡,失衡就是利益的不平等。事实上,承担改革成本的老百姓,并不完全是改革成果的拥有者和享受者。有资料显示,2003 年我国拥有超过 100 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 236 万人,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 9690 亿美元,而 2003 年我国的 GDP 是 1.4 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市场经济控制在部门利益集团的手中,成为他们摄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这种市场经济无疑是一种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的本质正是如此:它们通过“官商勾结”来取得市场经济中的特权,又通过这些特权在市场经济中翻云覆雨。也就是说:

“权贵的脚”可以随时踩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损害而得不到补偿是很可怕的。它会导致人们对改革共识的破裂和人们对改革动力的丧失,严重地影响社会和谐,产生“民怨”的积累,“民怨”就可能变成“民怒”,怨恨成为他们情绪的主体,一旦与社会擦出火花,就可能以狂热盲目的形式发泄,以此引起社会关注,矛盾指向掌握社会资源最多的政府机关。所以说我们的改革观应当包括公平这个人类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改革的核心价值是人民的利益,要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弥合社会发展裂痕,促进社会和谐。

三“国民幸福指数”是全面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指标

首先,“国民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必然使人都有幸福感,就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健康状态。“国民幸福指数”是全面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指数,它比仅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 GDP 还要全面得多。

“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由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是不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种新的衡量国民财富的指标。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善治、经济特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GNH)。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的“不丹模式”。^①

其次,“不丹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习惯于把幸福定义为“物欲”,所以崇拜GDP,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手段,把研究目标定位于怎样实现人的财富最大化;而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财富仅仅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当一个人处于贫困状态时,物质财富的增加会带来幸福总量的增加,但金钱积累到一定程度,情形就不再如此了。这在实现中表现为,个体的快乐与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财富以外的许多其他因素。所以,英国人也认为,衡量一个国家贫富的最佳指标并非国民生产总值(GNP),而是国民快乐总值。幸福并不等同于利润,如果用“幸福总值”衡量,恐怕是“精神利润”越多才越幸福,它包括健康、进取、舒适、自由、安全、充实、富裕等。

其实,以快乐来衡量人的幸福与否的标准,自古以来一直盛行。我国有句民谚:好过不如得过。日子好过当然是指富裕,这里的“好”字,是物质的。而得过的“得”是得意的意思,这是精神的。意思就是:过物质上富裕的日子不如过精神上愉快的日子。这里的“得过”,就是快乐总值。《红楼梦》中贾府大小姐元春,进宫当了娘娘,过上了天下第一的富贵生活,可是并没有感到快乐。在回

家省亲时对父亲叹道:“田舍之家,齑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总无意趣。”这就是“好过不如得过”的典型。美国的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和埃德·迪纳已经研究证明,财富是一种很差的衡量幸福的标准。人们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幸福。在大多数国家,收入和幸福的相关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有在最贫穷的国家里,收入才是适宜的衡量最幸福的标准。从总体上讲,富国的人看起来要比穷国的人幸福,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财富之外的其他因素。^②近些年来,有众多媒体报道说:国内中产阶级有钱有房有车,但他们缺少幸福。其实幸福和物欲享受是两码事,“中产阶级”焦虑什么呢?据说主要是“社会保障”的匮乏、“竞争压力”的增加、“难有安全感”等等。从中产阶级生存状态折射出社会的症结所在——过分注重物欲的满足,而忽视了社会公共生活和个人的精神满足。从全球视野看,人均GDP很高或经济实力很强的一些国家(如美国),虽然那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但与“很幸福”还相差甚远。《幸福研究杂志》近日公布的“生活满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加纳名列前茅,英国反而被远远甩出前20名之外。乌拉圭虽然没有摘掉贫穷和贫富不均的帽子,乌拉圭人的幸福感近些年却增长了近10%,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坦桑尼亚等国的“国民幸福指数”很高,这些国家5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而美国这一比例为39%,法国为31%,德国仅为20%,在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口只有36%。^③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得到快乐呢?古人说:乐莫大于无忧。就是说,最大的快乐就是没有忧愁。尽管物质生活水平是让人们产生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条件,但还要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如与家庭的关系、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对文化娱乐的享受、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有安全感等。我们不应该放弃物质福利的发展,它是人的幸福感的基础,但这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发展模式不能将最终目的与手段相混淆。对照中国这20多年来的发展,不丹模式很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平均达到了年增长9%的高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是经济发展的好处并没有普遍惠及广大老百姓。从1995年之后,国民幸福指数非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上升,反而逐年下降。这就不由得使人发问: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最后,探索构建我国“国民幸福指数”

比起以前我们用GDP、物价指数、社会治安评估等各类具体的数据而言,“国民幸福指数”有最大两个特征:一是概括性,即国民对各类与自身生活状况和生活环境有关的一切条件的总体感受;二是评价主体归位,即这种指标的表达在民众而非官方,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不丹的实践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研究“不丹模式”。生产总值可以由数式演算出来,那么幸福(或快乐)又该怎样演算出来呢?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并指出,国民幸福总值是一种革命性新理念……能让我们更好了解政策和社会潮流改变如何影响生活质量。英国研究人员对此研究出了一种“以工作日再

现法”的计算方法。

我国怎样构建“国民幸福指数”呢?胡锦涛同志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固国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十三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⑩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为我们构建“国民幸福指数”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从国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构建我国“国民幸福指数”。

$$\text{国民幸福指数} = \frac{\text{国民幸福期待实现值}}{\text{国民幸福期待值}} \times 100\%$$

国民幸福期待值是不固定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各不相同。我国到 2020 年国民幸福期望值如下。

1、在经济方面

① 人均 GDP 在 4000—5000 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美元币值变动等因素);

②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到 60% 以上;

③ 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 30% 以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40% 以下,全部人口中最低收入 1/5 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 50%;

④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00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8000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5:1(按 2000 年不变价格计算)。

2、在社会方面

① 基尼系数在 0.4 以下;

② 社会基本保障覆盖率达到 100%;

③ 6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 年,大学入学率 20%;

④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30 平方米;

⑤ 城镇化率超过 50%;

⑥ 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 20%;

⑦ 每千人医生数 2.8 人;

⑧ 预期寿命达到 75 岁;

⑨ 文教体卫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0%;

⑩ 刑事犯罪率降至¹⁵起/万人以下!

⑪ 城乡贫困人口日均消费支出小于 5 元的人口比重降至 0。

3、政治方面

① 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

② 每个公民真正当家作主,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有平等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罢免权;平等享有收入分配权。

4、环境方面

① 能源利用效率按 2000 年的价格计算,千克煤当量的产出达到 20 元(相当于 2.4 美元),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

② 城乡居民的安全卫生水普及率达到 100%;

③ 大气、水质、噪声等环境污染指数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

5、制度方面

①“廉政指数”(全国检察机关直接立案的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数与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数之比)降至 10 起/万人;②非正常死亡率(反映政府管理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降至万分之一。

我们认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国民幸福期待实现值接近国民幸福期待值是可能的,即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可以接近或达到 95% 以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喜景观。

[注 释]

① 马克思.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280—281.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32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273.

④ 列宁.论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M].列宁全集(第 2 卷),81.

⑤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M].列宁全集(第 6 卷),37.

⑥⑩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演[N].2006-04-24.

⑦⑨ 恩里克·金塔尼亚.国民幸福指数理念值得借鉴[N].参政消息,2006-05-28.

⑧ 理查德·埃克斯利.幸福不只体现在拥有物质财富[N].参政消息,1999-01-27.

(责任编辑:朱德东)

Human development, harmonious society and Chinese happiness index

YANG Zuo - shu, YANG Xue - s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Deep discussion on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attaining core value objective of human free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Several theoretical mistak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must be avoided and "Chinese happiness index" is the important index to measure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initially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appiness index".

Keywords: human development; harmonious society; theoretical mistake; Chinese happiness index